

类 号



( )

编印单位

材料时间 年 月 日

军事学院图书资料馆

一九 年 月 日

郭公山革命斗争情况简述（初稿）

——婺源县地方革命斗争史资料之一

中共婺源县委革命斗争史编纂组编印

1959·2·

## 鄣公山革命斗争情况簡述

(初稿)

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起，即一九二七年的下半年，鄣公山就有了革命思想的傳布。当时革命思想傳布的来源，是由該地革命先烈余玉堂同志往上海卖茶叶期間，参加××茶樓集会而接受了革命思想以后回家傳布的。余玉堂同志傳布革命思想的方法，主要是利用朋友交談，現身說法去进行。如：一次玉堂同志在农民汪兆太家玩时，兆太談及取亲負債 300 余元，生活困难，玉堂同志即安慰地說：“沒要緊，穷人以后有办法”；又一次玉堂同志与农民汪良祖等人一起玩时，良祖羨慕富裕戶社兼家有錢，生活好，玉堂同志即反駁說：“这有什么好，只有穷人以后有办法，我宣向（玉堂同志乳名）就是喜欢穷人”。玉堂同志並把衣服不足的青年农民余兴錦、余洪祐等人團結在自己的周圍。多年沒有回家的汪賀美同志（上海××里作工人，玉堂同志从上海卖茶叶时，吃住都在他那里），也于同年十月間返回了鄣山村，賀美同志回乡以后，很少到自己家里去，經常与玉堂、兴錦、洪祐等人不离左右。从此鄣山村便有一群先进青年农民直接或簡接地向广大貧苦农民展开了革命思想的傳布。

一九三二年二月間，正当中央紅軍反圍剿节节胜利之际，在鄣山竹园洲上，出現了紅軍駁壳队战士卅余人，他們是由休宁石屋坑胡志同志引路而来的。当时鄣山群众从一时摸不清底細，故而誤为兵变

逃往上山。余玉堂、余兴錦二同志不但沒有逃躲反而挺身直上竹园洲上与红军駁壳队战士接見。接着余玉堂同志便拿茶給红军战士吃，兴錦同志即大声向逃往山上的群众說：“这是自己的红军队伍，大家不要害怕……”。红军駁壳队战士吃茶休息后，在玉堂、兴錦二同志倍送下，准备走老固尖（山名）下，去洪沅工作，但因洪沅联有十八个小村，红军人少，不便行动，故而轉往江坑桥去衙門。

红军战士走后，当晚玉堂、兴錦二人便召集青年群众（汪賀美、余洪祐、余灶盛、汪林美、汪广全、余昌茂、謝永法，謝至法、汪灶賀、余規法、余德興、汪招美、余日興、余三发）等十余人在巷里开会。会上玉堂同志說：“今天来的几十人，是正式的工农红军，他們是为穷人翻身、做秘密工作的，大家千万不能与別人講，就是老子、儿子、老婆都不能講”。接着問大家是否可以做到，青年群众一致回答：可以做到。玉堂同志接着說：“他們是红军的宣传队伍，今天虽然已經走了，今后是会繼續来的，甚至有几百人来，我們應該首先做好內部工作，使群众懂的红军是自己的队伍”。青年群众当时很怀疑地問：“红军不是要杀人的嗎？玉堂同志即解釋地說：“不，红军要杀的是土豪劣紳，与国民党反对，是我們穷人的队伍，帮我們翻身，我們应大量支持他們”。會議最后，叫大家今后红军来时不要怕，并应向村內貧苦农民宣传，通过亲戚朋友关系去串連教育群众。會議直至半夜结束。会后，經過約半个月時間的宣传串連結果，全村除較富

的八妹、时欢子、余昭祥，伪保长余金荣四戶外，其余 58 戶均发动了起来，对红军有了比較明确的認識。

同年四月，又有红军战士 40 余人（当时领导人是洋油箱），由休宁高舍来鄣山，由高舍謝正发（鄣山人）引路駐在鄣山沅头，并派红军战士二人隨同謝正发入村找余玉堂同志联系，經過联系介紹以后，玉堂同志即至沅头，把全部红军接入菴堂休息。一边煮饭，一边由玉堂同志召集上次参加会议的十余青年群众到菴堂开会，並留参加会议人員在菴与红军一道吃饭。吃饭时，红军战士便向大家說“現在群众是否明确红军是自己的队伍”？大家一致回答說“群众已經明确”。红军战士接着說“既然群众已經明确，明天早晨就多搞点饭，请群众都来吃饭”。第二天群众都去吃饭了。饭后，红军战士向广大贫苦人民进行了一番宣传教育以后，便返回休宁一带去了。从此，鄣山的广大贫苦人民便与红军的关系密切起来了，並團結在红军的周围，逐步展开了革命活动。

革命的烈火在鄣山燃燒以后，因而就在同年五月間，婺、休、祁三游击根据地红军领导同志刘鍊标、李步新、关英，倪南山等同志，也亲自带队一百余人經老国尖到鄣山。为了保卫安全，群众自动配合红军战士放哨山头，防止伪軍袭击。在墙头上写了巨幅动人标语：要想饭吃，要想衣穿，只有农民个个起来，实行土地革命，苏区有田分，沒有剥削人；打倒土豪劣紳，消灭保甲制度，反对国民党抽收苛杂稅，

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蒋介石。红军这次休息一天，内部召开了会议，指定余玉堂同志负责地方工作，此后由大降往新门石屋坑而去。从此，红军经常来往鄣山，余玉堂同志也正式展开了地方工作。为了保持秘密和便利红军来往交通方便，玉堂同志即与汪贺美、余洪祐同志在沅头圩搭了一个大山蓬，以种山为名，吃住都在山蓬，进行工作。从而逐步培养了一批先进青年骨干，为后来该地建党、建团，成立红色政权，开辟新区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一九三四年一月，红军派余玉堂同志往车田白区工作，由于伪官吏告密，工作没有几天，玉堂同志便被捕入狱了，他在监狱中受尽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坐檟逼供，也未屈服，经过约四个月的监狱生活，终于同年五月间，经过刘毓标同志运用伪保长（余元发，是玉堂同志的伯父）的作用，保出返回鄣山。玉堂同志返家第二天即往高舍、石屋坑一带找党红军领导人联系工作，刘毓标等同志即着玉堂同志在休宁蓬春一带开设粉坊，以作掩护，收集情况，调运粮食给养红军。但是不久，又被休宁伪军发现目标，因而玉堂同志又于同年七月间再度潜回了鄣山，负责地方工作。这时，玉堂同志为了加强地方工作，在上级同意下，于八月初四的一天晚上，在余日兴家里，正式介绍了汪贺美、余洪祐、汪坤美、余日兴等四位同志入党，他们都填了表，盖了指模，表示决心为革命奋斗。从此，鄣山便有了党的组织活动，革命进入了新的高潮。不久，在刘毓标同志亲自参与下，于余新发家

魚塘里，又正式組織了农民团，由汪林美、余春树同志分別担任郭山上、下村农民团长，保甲长余元发、余兴达分別担任了上、下村农民書記。起着白皮紅心作用。同期並建立了青年团的組織，由余裕南任青年团长，参加团的青年有：余兴祖、余先得、余振兴、余昌茂、謝陞发、余兴順、汪兆茂、謝洪发、謝正发、謝永发、汪良祖等十三人。並建立了红军后方医院和交通部。

革命的烈火，就这样在郭公山熊熊地燃燒起来了，它照亮了郭山受压迫受奴役者的心，它使飢寒交迫的貧苦农民看清了自己的出路，看到了光明幸福的远大前程，因而郭山的紅色游击区就这样建立和巩固起来了。这个革命的火錢並从此向外发展了。同年九月間，玉堂同志便派余裕南同志深入白区卓田做秘密工作，以开豆伏店为名，收集情况，运输貨物。接着又派洪兴至浮梁开設店舖，以便进行秘密工作，同时鑑派洪兴妻身汪賀美、汪昭美二人往浮梁牛角<sup>打</sup>土坑窑工作，以土坑窑工人为活動中心，並与浮梁洪兴开設的店舖相呼应。玉堂同志志自己因在伪軍面前已暴露目标，故而从此隨軍行动。地方工作交由余日兴、汪洪祐等同志負責。

自从郭公山建立了革命游击根据地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便想扼杀这个革命，来維护他們的黑暗統治，因而不擇手段地买通叛徒洪兴，将我将浮土坑窑里工作的賀美、昭美同志捉去枪决牺牲，致使窑里八百多工人就有六百多人均已报名参加的革命組織受到了破坏。一九三

五年二月，紅軍領導人刘流标同志，率部一百余人剛在佛子坑休息时，車田劣紳洪孟公、洪干群亲带伪軍聶連长又来偷击我軍。尽管国民党反动派以及土豪劣紳是这样的毒辣，革命的火燄是扑不灭的，相反地燒的更猛，刘流标同志立即組織队伍，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同样，游击区的人民也並沒有被吓到，而是革命意志更加坚强了，他們挺起了胸，拿出了梭标，与敌人展开了残酷的斗争。一九三五年三月間，玉堂同志返回了鄣山一次，当时发动了余仲开、余进兴、謝湘嬌（女）、余接青等人正式加入紅軍队伍，隨軍游击。同年四月間，在紅軍的直接领导下，以鄣公山、洪沅为重点，正式成立了“洪山中心区”的紅色政权。所括小村有。鄣山、洪沅、沱川、溪头、金崗嶺、小橫坑、塘，佛子坑等十多个小村。成立前，由紅軍老鄰同志和地方工作的余日兴、余觀法、汪新美、施×庆等同志进行了詳細研究，選擇了消息灵通、交通方便，易于窺視敌人行动，而敌人不易发现我們的鷄樓尖（洪沅西坑屋背后）为区府所在地，在此搭盖了机关篷，为了加强保卫，紅軍发来了步枪二支，經常有哨兵一人駐守。当时由余日兴任区委书记（改名朱光文），老汪（又名土老）任区长，倪南山任組委（因在平鼻嶺战役中掛花，下放休养），小老朱（女 浮梁人）任妇女部长，兆何英、老方（老方經常駐此塘窑工作）負責財政。为了加强对小村的领导，和巩固发展小村工作，隨着派：施有府（嶺脚人）到金命嶺工作，汪友裕（洪沅人）到洪沅工作，細眼向（車田人）到車田

工作，麻坤（汪仁后人）到塘窑、汪仁后工作。这样，一个完正的紅色中心区政权便建立与巩固了起来。同年六月間，考汎、柑子灣、楊梅灣等地也都先后和革命組織分別接上了头，因而考汎、柑子灣、楊梅灣等地也成立了游击区，成为洪山中心区根据地的前哨。革命的火燄和它的苏区游击根据地，就这样地逐渐向外蔓延和发展了。十月間，紅軍再派余元发往車田工作。这时，紅軍正規軍队伍，亦有了极大发展，因而在平鼻岭战役中，一举歼灭敌軍一个連，缴获步枪五十多支。

紅軍和这片游击根据地，就是这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逐步建立壮大起来的。敌人虽然想尽了办法，用誘騙的手段，买通叛徒，用重兵包围的毒心，合圍扼杀这个革命，可是都不过是枉費心机而已。而紅軍和游击根据地却象一座大山一样，聳立在务汎的北部地区。它唤醒全县人民，必須起来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卖国賊蒋介石，人民才有飯吃，才有衣服穿，因而許多有志青年和飢寒交迫的苦农民紛紛加入苏区参加革命工作，这下敌人改用了經濟封鎖的办法企图餓死紅軍和根据地人民，企图冬死紅軍和根据地人民，他們在車田清帝等地用了許多加禁条例，如，只准許老百姓挑柴米上街去卖，但不准把油盐米布及一切日用品带进苏区否则即以“通匪”罪名加以监禁更毒辣的是，有的地方被敌人拔掉青苗，或把成熟的作物剷掉与放火燒燬。的确，情况是越来越困难了。可是，英勇的紅軍和受过党的教育的苏区人民，也同样沒有被这个困难所吓倒，在党的领导之下，而是更英勇

更机智地突破敌人的經濟封锁，来解决生活的需要。为了解决苏区人民和战士的物质供给，党领导群众打开敌人各处的仓库，运走积谷，没收土豪劣绅的余粮，另一方面又派出我们的采购员，深入白区进行活动，运用串连的方法，通过亲友的关系，去找我们直接的采购员，甚至把白区的保甲长都争取过来为我们当采购员，从而为苏区采购了大批物资。但是运输又是一个困难，这只有依靠群众和采购员日去夜归。风雨无阻地把物资运回来。如一九三六年一月，鄣山红色群众汪得祖、汪寿美、余兴锦、余观法等五人，連續几天几夜不睡觉，不休息走雪路至浮梁运粮食；英勇的汪林美、余元发二同志为了运输货物，被万恶的劣绅洪干群捉去务城光荣牺牲了，其他同志仍把汪、余二同志所采购的货物运达苏区，就这样不顾个人牺牲，前仆后继的精神，突破了敌人各种经济封锁。

一九三六二月，革命的火燄进一步向岭脚、西坑、余黄村、甲庄、松坑、白许、咏路、横坑段、南坑村下一带发展了，并在这些地区发展了一批人参加革命，建立了交通站。由于游击区扩大，红色政权日益巩固，红军队伍不断壮大，因而红军主力在战略上也就能夠取得主动权和大规模的行动。同年四月间，红军在刘毓标、李步新、关英、倪南山等同志统一领导下，集中了十二个连（约1200多人）的兵力，在鄣山经过三天的休整，便经浙门向开化发展了。

就在红军出征的时候，敌人又来抄山围剿了，红色群众即用快速

巧妙、英勇机智的精神，将机关蓬、仓库、伤員今天移这，明天搬那，一点影跡也不会被敌人发觉，敌人查問山蓬干什么用的，群众即說：“为了逃紅軍，搭出来自己住”，就这样混了下去，从而保住了仓库、机关蓬、伤員的安全。

紅軍主力在开化游击活动了二个多月，逐于七月七日天剛亮时，一举攻入开化县城，当场打死駐守敌軍伪連长一人，（伪县长当时不在家里），打死打伤敌軍一連多，其余敌軍全部成为了俘虏，繳机枪六挺、步枪、子弹无数，放出了犯人数十个。在开化县城耽了四小时之久，經即回师务沅，經离齋官及至三坑沱口，沿途摧毁伪保联、碉堡数十个，繳机枪两挺，浮 伪保联丁三人。并于月岭四山伏击，誘敌深入，又一次歼敌四六旅一个連于月岭脚，除当场打死打伤敌軍卅余人，又繳得机枪两挺，步枪数十支，子弹无数，其余敌軍，仗水坑掩护挾着尾巴逃回清华去了。我軍返回鄣山休息。从而紅軍实力大大加强，声勢震动务、休、新、浮边区。

同年八月間，务、休、新、浮游击根据地除留下倪南山、張政委等同志分头負責，駐守机关蓬，坚持游击根据地工作外，主力紅軍便开始向于全，昌化，宁国一带发展。在宁国一带轉战迂回半年之久，曾攻打过一次宁国府，未遂。一九三七年一月間，这批紅軍主力，准备过江进入敌后抗日根据地，但因蒋介石加紧殘害阻击，以伪軍刘建叙二万多之敌兵，包围我仅有十二个連（約1200多人）的紅軍战士，在敌众我寡

的情况下，我軍以百倍英勇的精神，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当时留下一营人由玉堂同志負責（代里营长），繼續在宁国一带开展游击根据地工作，后因战略失利，叛徒余接青（付連长）带弟兄十三人投敌，因而余玉堂同志被捕，忠貞不屈，在敌人的屠刀下，光荣牺牲于宁国府之中国城。其余紅軍曾于一九三七年二月間，一度返回务沅，經沅川准备由上山，汪仁后去鄣山在平舟岭途中遭上了敌人襲击，开火交战后，轉往祁門去了，直至国共合作編入新四軍正規队伍。

游击根据地在倪南山、張政委等同志領導下，在深山中繼續搭蓋了許多机关蓬，也进行扶养伤員，坚持游击根据地工作，并繼續进行了反霸打土豪的斗争。但是，由于主力紅軍轉移以后，游击根据地武装力量薄弱，加之伪軍重兵駐守，以伪軍刘、廖、焦三个伪营长領一千多敌兵圍剿我革命根据地，强迫群众併村搬居，放火燒山。白山游击根据地机关蓬負責人何仪（土改时已鎮压）貪生求榮，叛变革命，当上伪自卫队分队长，帶領伪軍圍剿我机关蓬，張政委为之被枪杀，鄣山一带游击根据地，由于張老金叛变，倪南山同志飽受风霜，幸被脫险，只身潛逃上山，但鄣山群众已在伪軍强迫监督下，搬居至洪沅、清华、沱川以及休宁之逢春一带去了，因而倪南山同志即无处联系，也无处留身，七天七夜在山上吃草皮樹根度日，在环境十分恶劣的情况下，倪南山同志只的暫时离开可爱的革命游击根据地，潛往祁門一带去了。

一九三七年四月間，群众虽然一度回山做茶，但伪軍便派了二个連以“保护”为名，对群众实行監督。茶后，又繼續强迫群众下山。直至同年十一月間，群众才陸續搬回了鄣山；而伪軍同样是經常不斷駐守与監視群众。並于四二年將汪艮祖、余仲开、謝細嬌（女）等八位同志捉至清华受刑。后介務城入獄达半年之久，迫供未出，經保分別先后釋放。四三年五月，在休寧伪軍~~夢~~鏡安、务沅伪軍李祐生、汪定远、叛徒何仅的屠手下，分別將我革命同志余昌茂捉至車田，迫供未出，光荣牺牲于車田；又將我革命同志謝正发、張志澄、余兴順捉至浮梁密里，迫供未出，光荣牺牲于密里。从此，革命在我县鄣山地区，暫時轉入底潮，白色恐怖籠罩着鄣山。

在形式，鄣公山地区革命，是一度失利了，可是，革命的种子在苏区人民的心里头是永远存着的，只要春风一吹，它又会发芽，生枝、开花、結果。当年該村 60 余戶，280 余人，有十四人直接參加了紅軍的軍事行动，有十三人担任了地方工作，其他全部男女老少（除极少数貪生求榮，叛变或脱离革命外）都为党和紅軍做了番可歌可泣的光荣工作。如：通訊件，运物資、保守秘密是他（她）們当年的經常任务连白狗子企图用米糖菓誘騙小孩洩露紅軍秘密消息时，小孩子都能夠很玲俐地回答說“我不懂，我不知道”。一九三五年农历十二月卅日夜上紅軍和地方干部正在余新法家樓上开会，一不防白狗子摸到余新发家堂前来了，紅軍和地方干部即把手枪上起紅膛来，准备併

一击，跳楼逃往继上山；可是余新发的母亲（60多岁了）却很镇静，很机智地请白狗子吃了茶吃南瓜子，并和白狗子聊起天来了，白狗子吃了茶和南瓜子以后，看看没有什么，也就走了，楼上红军和地方干部又继续开会了。象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这里，我们也就可以看出，当年红色群众对革命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虽然，由于国民党的残害，数次重兵围剿，长期驻守，强迫併村搬居，因而不能够把有关革命文物保存起来，但他（她）们盼望共产党，毛主席、红军和新四军的心情，是万分迫切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她）们的希望，不是幻想，而是确切的很。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新四军在倪南山、熊兆仁、余华、洪海熹等同志领导下，由新门经沈川胜利地到达了鄣公山。革命烈火重起高潮。红色群众所受国民党反动派的痛苦和怨气，终归有朝一日吐洩出来。当地红色群众见到多年未见的倪南山同志，尤如久别重逢的亲生父母，他（她）们有诉不尽的心情，他们依然如故地一个接一个地叫声老倪，眼泪便情不自禁地脱眶而出。他们也清楚地知道，只有把悲痛化为力量，彻底摧毁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才有自己出头之日，因而在同年十二月间，在倪司令领导下，再度建立了村政权，设立村长，保家队，积极想法扶养伤员，建立仓库。在党的领导下，他（她）们继续地把交通送信，扶养伤员、保守秘密工作担当了起来。其中汪良祖等同志除担任村长、查哨等工作外，並协助新四军汪时罗等同

志，前往石屋坑、里村、汪家村、岭脚一带开展工作，建立村政、保家队。并于一九四八年八月间，正式成立了洪沅乡民主政权。当一九四九年三月间，新四军在甲路成立务沅县民主政府时，鄣公山光荣地派出了汪艮祖、汪兆太为代表去参加建立民主县政大会。从此，鄣公村又成为了新四军的后勤部和大后方，积极起着支前的巨大作用。直至务沅全部解放，全国大陆解放。

解放以后，在党的关怀下，红色群众重建了自己的家园，高山上安上了电灯，买了收音机，装置了喇叭筒，随时可以听到上级党委的指示，也可以随时收到各地传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喜讯。他们（她）们和全国各地人民一样，正在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乘着东风压倒西风之势，正向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迈进。